

“多元现代性”理论视域下发展与人性关系的反思与重建

王 鑫

摘要：从20世纪中叶迄今，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反思与批判不断向纵深拓展。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着眼，发展不仅仅是一种单一的社会经济活动，更是一种对合理性意义上人性自我实践、自我完善、自我自主探索过程。启蒙现代性以来，西方社会三四百年的进程中，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累加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蔓延，其结果是现代人在享受物质丰饶、经济繁荣和科技进步的同时，却也承受着日益功利化、疏离化和非人化发展所带来的后果。后全球化时代，日益觉醒的现代人逐渐意识到，不加约制的发展绝对不会带来美好生活与人性的完善和提升。面向未来，人类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应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增长、物质占有以及人类自身的享乐问题，而是在确立合理、优良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发展方向的同时，更关注优良人性的生成和化育，即通过人性生态品格的塑造，从根本上克服人类社会进程中的生存危机、价值危机以及人性自我疏离危机，在人与自然、社会共同体、人与自身的和谐关系中，寻求一种新的与人类文明和人性演化规律相契合、相适应的永续发展的新途径，迈向一种兼具真善美的多元现代性发展新格局。

关键词：多元现代性；人性；发展主义；异化逻辑；生存新境界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3）02—0018—08

发展与人性之间的关系，既是一个艰深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在人类进化和进步实践中变得日益复杂的现实难题。自20世纪50年代始，国际社会、国际知识界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逐渐达成了共识性的定见：合理的发展价值观与优良人性的建构和实现之间，本质上是双向同构、内在耦合的关系。

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实践中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有机统一基础上人性自我实现、自我完成的载体。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性（理念和假设），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观（理念、模式、实践）与之相适应。与此同时，发展也影响和塑造了人性，不同的发展观所造就的人性品质及其对世界的理解和践履方式也是截然不同的。然而，正是这一看似不争的事实，在人类历史上却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探索过程。其中一个难题是：不断提升和完善人性，使人获得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谋求发展的终极目的，但是不加约制的“发展”却并不一定能带来人性的完善和提升。因此，后现代化时代就需要对人类发展的理念、逻辑、范式、价值目标等做全面、深刻的审视。

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价值观基础理论研究”（项目号：19JJD710001）、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发展合理性与优良‘人性生态’境界的达成——基于制度理性与美好生活内在耦合的价值逻辑”（项目号：2019C0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鑫，女，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后流动站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人学、价值哲学研究。

一、多元现代性理论视野的介入：发展与人性关系的嬗变及其有效阐释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后发展时代为世界带来了一个多元现代性的发展格局。多元现代性视野的介入激发了人们重新去发现发展的特殊性、同质性和差异性，重新去探索发展的多种模式和多种可能性。当代以色列著名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指出，所谓“多元现代性”指的是“现代性的历程，最好看作是现代性的多元文化方案、独特的现代制度模式以及现代社会的不同自我构想不断发展、形成、构造和重构的一个故事——有关多元现代性的一个故事。”^①多元现代性理念实际上受到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它不仅反对西方现代性发展的唯一有效性与合理性，而且也强烈地质疑西方霸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可以说，多元现代性发展是目前国际社会关于发展与人性关系的最新理解，它一方面承认西方现代性发展的历史优先性和引领性事实，另一方面又站在人类整体性福祉最大化的立场，充分意识到发展不是只有西方现代性一种模式，世界各国的发展本身应该呈现出多种多样的或多元发展的现实可能。在发展与人性的关系上，多元现代性发展致力于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以及人性自身的丰富和完善。

然而，启蒙时代以来，人类遭遇了一种被狭隘化、单一化的发展与进步观念，一场发展与人性之间的悲喜剧由此上演。自进入19世纪以后，深受启蒙理性和崛起中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影响，人类关于发展问题的研究变成了一种专注现实领域的实证研究，其结果是使发展原本蕴含的主体道德提升、人性完善等丰富价值意蕴被资本逻辑、消费享乐和财富最大化等显性的经济、生物、文化事实遮蔽。经济增长和财富累积成了发展的唯一目的。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如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说道：“经济发展问题实质上就是通过增加人均产出来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使每一个人都能消费得更多”，“经济发展实际上等同于经济增长，虽然前一词通常主要用于贫穷国家，而后一词用于富裕国家”。^②阿瑟·刘易斯在其著作《经济增长理论》中指出，“经济发展是一个增长过程，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发展的关键，甚至发展即是增长”^③。按照这一理解，当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代名词时，其功利主义人性特质愈发明显。发展被视为目的，而人则成为发展的工具和手段，人的自主性、能动性都被轻视或者遗忘了。从历史和实践的后果来看，这种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被片面理解了的发展，是无限地追求物质财富和科技进步，盲目迷恋、奉行资本逻辑的功利主义和不顾一切地开发、攫取自然资源的短视行为。实际上，人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人类整体性福祉的增进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目标。这一看似常识性的认识却是在人类付出了一系列惨痛代价之后才获得的。当承载了人性整全性理想的“发展”被狭隘化、单一化地理解为经济增长和财富累加时，发展和人性的自我异化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其危害无疑是多方面的。首先，这种被片面理解了的发展将人变成了一种亚当·斯密意义上精明算计的理性“经济人”，使人性变得单一化、功利化、扁平化，于是人在追求金钱财富和权力时永不知足、贪得无厌。没有人否认，经济增长和财富累积提升了生活质量、改善了人类的生存境遇，然而，如果这种发展的代价是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的内在性被掏空，使人性变得物化、世俗化、单一化，那么这种发展一定是存在问题的。其次，它造成了自然生态资源的严重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基础受到威胁，进而引起世态、心态的失衡。“在个人至上、物质至上的理念追求下，人性价值信仰迷失、精神颓废、道德堕落。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过程中，人类充分挖掘自然外在价值和工具价值，倡导向自然进军，疯狂地掠夺和攫取自然，遗忘了人类生存的价值与意义，迷失了自我，滋生了人类中心主义，或者沦为欲望的奴隶，或者造成人与自然的隔离，从而导致了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锐减、能源枯竭等生态困境。”^④在这种发展价值观的引领下，历史总体性、实践主体性以及人性整全性的理想必然会与人类渐行渐远。

① [以色列]S.N.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4页。

② [澳]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经济发展思想史》，唐宇华、吴良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2、53页。

③ [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周师铭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

④ 牛庆燕：《“爱自然”的人性生成与生态困境的超越》，《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合理的发展观应该体现对人的（身心）关怀，以人性的良序进化和人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解放为根本。可究竟什么样的发展才能带来人性的完善和提升？历史上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从未停止。人性是在人与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独特属性。世界著名哲学家、文化哲学的创始人恩斯特·卡西尔说道：“人之为人的特性就在于他的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①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的自我实践而不断变化和展开的。从发展观与人性观之内在关系的演变脉络来看，二战以来，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发展理念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增长本位的传统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基本上延续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发展理念，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然而单一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是有限度的，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对发展与增长有着精辟的见解，“增长本身是不够的，事实上也许对社会有害：一个国家除非在经济增长之外，在不平等、失业和贫困等方面趋于减少，否则不可能享有‘发展’”^②。二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综合发展观。这一时期出现了一股否定经济增长的潮流，将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即增加就业、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和消除贫困等作为发展的目标。而它的局限在于过分强调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没有从后发现代化国家具体的、现实的、多元的立场出发，忽视了其自身的传统、文化以及历史和制度的特点以及内在转型的需要。但综合发展观的价值转变是值得肯定的，它是对长期以来将发展的本质等同于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的一次变革，将人们的视线从经济增长转向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社会文化和道德方面的提升。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在《新发展观》中指出，发展是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是“以促进该共同体每个个别成员的个性全面发展”^③，是为全人类和一切人的利益服务的发展，是促进人类和一切人自身的发展。罗马俱乐部主席奥尔利欧·佩奇指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人的发展是人类的最终目标，与其他方面的发展或目标相比，它应占绝对优先的地位。”^④三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可持续发展观。可持续性发展观主要是从当代人类生存困境和危机出发，将发展置于更广阔的视野，强调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自身生态保护中寻求协调发展，其核心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⑤。

发展观的演进历程表明，发展既不是一个单一的经济学事实或者社会实证研究，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线性进步概念，发展作为实现美好生活和人类整体福祉最大化的手段，是一个包含了价值、文化、道德等人文因素的综合概念。从历史和实践的结果来看，由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那种狭隘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累加，割裂人与自然的关联，忽视对人性自身提升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必然是对人性整全性理想的背离。德国学者马利昂·格莱芬·登霍夫提出：“我们这个社会的特质是不知道道德界限为何物的自由的概念；我们这个社会的特征是对取得新进步和对时刻增加的期望的满足的无限制的追求；所有的东西必须越来越大，所有的东西都要产生更多的东西，更多的自由、增长、利润，……这种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精神上的空虚、失意和异化。即便是对于国家，经济也不可能是惟一的。”^⑥

二、局限与弊端：后全球化时代“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人性危机

西方现代性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总的来说，现代性发展实践既创造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与进步，如物质丰裕、生产高效、科技创新、数字化和智能化程度的提升以及人类整体知识结构的丰富等。但与此同时，西方现代性发展逻辑所隐含的局限与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如以资源、

①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年，第20页。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张景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46页。

③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22页。

④ [意]奥尔利欧·佩奇：《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页》，王肖萍、蔡荣生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第125页。

⑤ 参见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⑥ [德]马利昂·格莱芬·登霍夫：《资本主义文明化？》，赵强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7页。

财富占有为目的的权力扩张逻辑、无限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资本垄断、生态帝国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基于上述立场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自我中心论等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这种发展表现出人性中单面化、功利化、世俗化和自私自利的一面，更为关键的是，资本主义文化不仅没有将人性中这些堕落和污浊的方面加以抑制，反而却将这些视为合理的接受下来，因而与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相伴而生的必然是人性的异化。

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是一种现代性话语和意识形态。它起源于二战以后欧美特定的制度环境，通过对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许诺，逐渐成为一种被国际社会追捧、为后现代化国家所崇奉的价值理念。冷战结束以后，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更是演变成为一种全球化潮流，这种潮流一方面坚持将社会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和GDP指数的提升。另一方面，它预设了西方现代性发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认为后发展国家发展与进步的唯一途径就是遵循西方现代性发展的步伐，然而，当这种发展方式被后发展国家全盘接受并应用于本国的实践以后，一个吊诡性现实是很多后发展国家出现“有增长无发展”，甚至“无增长无发展”的现象，产生了包括贫富悬殊拉大、城市化过度、生态环境恶化等深远影响。觉醒中的人们开始意识到，不加制约地发展绝对不会带来美好生活与人性的完善和提升，反而导致了物质财富疯长，但人性的内在精神却面临极度空虚的窘迫境地。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蔓延，其结果是现代人在享受物质丰饶、经济繁荣和科技进步的同时，却也承受着日益功利化、疏离化和非人化的发展所带来的后果。

(一) 技术发展的非人性、反人性效应

20世纪以后，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及其在生产与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人类对科学技术进步的强烈信念已经逐渐演变成一种僵化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技术的非理性滥用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变得面目全非，如工业排泄物污染了空气及海洋，化工制品的过度使用、核武器的威胁以及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等正在摧毁人类适宜居住的星球。现代人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肆无忌惮地榨取工业技术成果，“其中心就是对持续的线性进步、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生产的扩大、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不断满足人类需要以及随着对自然规律的科学理解相应产生的不断增长的对控制自然(包括人类本性)的超强自信。因此，极端现代主义是一个关于将科技进步应用于——往往通过国家——人类活动各领域的全盘幻想”^①。

技术的发展虽然带来了社会进步和物质的繁荣，却也背离了人类发展的根本目的，技术对现代世界的绝对支配地位反过来成为压抑人性的异己力量，人的独立性在这种对立中被抹杀，人沦为技术的奴隶，人性呈现出单一、片面和无个性的状态。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指出：“技术的统治使对人的生存的客体化达到极限，把人变成物，变成客体，变成没有自己的名字的人。”^②技术化程度的提高同时也加深了技术对人的奴役，使劳动者变得极端片面，就像庞大生产机器中可以随意被替代的零部件，这种单调、机械式的劳动和枯燥、呆板的气氛使人的自由和创造力丧失殆尽，同时也扼杀了人的好奇心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人呈现出普遍的无个性状态，且被悲伤、绝望的情绪笼罩。在这种氛围下，现代技术的发展把人的主观性挤压到一个极其狭小的空间里，使人遮蔽了或是遗忘了其他丰富性的可能，人性变得单一化、片面化、工具化和“非人化”，马尔库塞针对西方后工业社会不断加剧的异化关系，及其所带来的人的丰富性被赤裸裸的功利性和欲望性关系取代的“非人性境况”，指出“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共识：技术进步=社会财富增长(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加强”^③。

(二) 异化逻辑与欲望消费的蔓延

消费主义是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话语及其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激励人们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诱导着人类的物质欲望，刺激着人类的消费需求。这种欲望—生产—消费—废弃—再生产的方式为现代消费社会的生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西方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马尔库

① [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17—118页。

② [俄]别尔嘉耶夫：《末世论形而上学——创造与客体化》，张百春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第233页。

③ [德]赫伯特·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82页。

塞区分了“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所谓“真实需要”是出于人内心“类”的本质规定性的自主需求，而“虚假需要”是依照市场逻辑的运行法则诱导人的物质贪欲所带来的非自主需要，是有私心的剥削者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从外部加诸给人们的需要。当人的需要异化为虚假需要时，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就带有了无限性。当代美国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丹尼尔·贝尔指出：“资产阶级社会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它所要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它因而是无限的要求。”^①

风靡全球的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意味着一种异化了的生活目的，即消费不再是为了满足人的真实需要，而是为了满足人们无限延伸和永无止境的欲望，为了凸显身份和社会地位，为了博得倾慕与社会认同，即用物质财富的占有来填补人的非物质的精神世界的空虚。这种消费行为本身“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滋生一种贪得无厌的极度享乐主义”^②。人的价值被物的价值取代，人性服从于追求物质的欲求，进而陷入“欲望消费”的陷阱。在欲望消费的刺激下，人们购买的不仅是商品，也是象征财富、身份、地位、权利的符号。当现代人沉溺于物欲、权利、虚荣以及相互攀比和欲望竞赛时，人性的道德感、责任感和价值感知也被弱化了。弗洛姆认为：“消费本质上是人为刺激起来的幻想的满足，是一种与我们真实自我相异化的虚幻活动”^③，“在工业化国家里，人本身越来越成为一个贪婪的、被动的消费者。物品不是用来为人服务，相反，人却成了物品的奴仆”^④。

（三）人与自然生命系统的割裂

全球性生态环境的恶化并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是二战以来奉行无限追求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引发的恶果。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将人性的提升和完善、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和谐、人类诗意的栖居等全面的美好生活需求，局限于物质财富的占有和科技的进步中，并将这种非人化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作用于自然，割裂了人与自然生命系统的统一性和整体性。

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人类不断挑战着自然的底线，将自在自然界改造为属人的、为人服务的人化自然。在这种主客二分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模式下，自然界从万物的本源转化为对象性存在，当人类以自然的征服者自居时，便开始无限度地改造与主宰、践踏与破坏自然万物。奥地利比较心理学家康拉德·洛伦茨对人类的发展表现出深刻的忧思：与发展伴随而生的人类无限度的侵略、占有性行为，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即将消亡殆尽，这说明人类正面临着一种威胁，“即所有构成人性的那些特质和能力的持续性衰退”^⑤。美国著名社会哲学家芒福德针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疏离指出，“我们的时代正在由一种不得不借助工具和武器的发明去实现对自然的支配的人类的原始状态，转变为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的人类状况。在这种新的情况下，人类不仅已经完全控制了自然，而且也把自己从他的有机的栖息地彻底分离开来了”^⑥。

三、优良人性生态的理想：迈向一种真善美内在融通的生存新境界

启蒙以来，现代社会个体被资本逻辑、技术理性以及消费主义价值观所误导，错误地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本身，这种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对人性造成了不可磨灭的腐化和戕害，对利益和财富的追求占据了现代人的内心世界和世俗生活，人与人之间原本丰富的关系被“物的关系”取代，这一切皆由

①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68页。

② [美]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毕聿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页。

③ [美]埃利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欧阳谦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年，第134页。

④ [美]埃利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张燕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4页。

⑤ [奥地利]康拉德·洛伦茨：《人性的退化》，寇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页。

⑥ Lewis Mumford(1983). *Technics and the Nature of Man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ed. By C Mitchea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77.

于欲望的无限膨胀,最终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分裂。这种分裂使原本相互依存的人类共同体变得分崩离析,人的价值意义和道德责任信念的消弭以及人性自身的全面异化。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人类世界正式进入一个新的动荡变革期,逐渐变成一个单一体系、碎片化的世界。在世界疫情和国际冲突的叠加冲击下,经济逆全球化思潮正在发酵,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负面效应日渐凸显,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如何在一个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人类共同发展就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面向未来,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不应仅局限于经济增长、物质占有以及人类自身的享乐问题,而是在确立合理、优良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发展方向的同时,更加关注人性内在精神的生成、化育,即通过人性生态品格的塑造,从根本上克服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局限和弊端,在人与自然、社会共同体、人与自身的和谐关系中,寻求一种新的与人类文明和人性演化规律相契合、相适应的永续发展的新途径。

(一)厘清发展“如其所是”的本真

发展观念的偏离和扭曲,其根本原因是由于遗忘了发展的本真而引发了深刻的价值危机和人性危机。发展究竟以何种价值理念为基础才能形成一种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进而有益于人类社会向着美好生活和优良人性进化的方向演进?发展是人类所处的现实世界合规律、合目的的运动,其本质是人的发展。也就是说,发展的本质是为了人的发展,而为了人的发展理应是建立在人类整体的生存论基础上的发展。池田大作指出:“任何生命都把自己的生存当作至高无上的目的,这是生命世界里的原则。肉体的一切机能,都是为了维持生命的目的而组成的;心灵的活动也是为了能够本能地逃脱生命的威胁,甚至是为了能够事先觉察并逃避这种危险而巧妙地形成的。”^①当今时代人类面临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严峻的生存危机,究其根源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人类为了满足欲望性消费需求而牺牲人类整体的生存利益、置子孙后代的生存于不顾的行为。这无疑背离了作为共同体的人类整体的生存论,也偏离了最初所承诺的人类长久的可持续性生存的初衷。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社会发展所要遵循的客观规律,这就是说合理的发展既要以满足人类共同体生存的基本需要为目的,还要考虑到自然系统的生态性和自身的承受能力和限度,以及当代人与后代人的生存利益。

从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来看,曾经在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人们天真地认为只要发展经济就能消除贫困、提升就业和收入以及摆脱不发达的状态,从而带来普遍的幸福和美好生活。然而在经历了单一经济发展的阶段之后,人们发现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所期望的美好生活,反而带来的是社会结构分层、阶级分化和贫富差距被进一步拉大等负面效应。法国学者奥克廷斯基·维克多在其著作《未来启示录》中指出:“我们唯一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为什么’这种具有价值涵义的问题,越来越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而一旦发展的方向发生了迷失,人类的实践行为将毫无疑问地变得愈加盲目而放纵。”^②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人才是发展的目的,那种一味只追求经济增长而脱离人的发展必然是本末倒置的。从本质上说,合理的发展在人类生存与生活实践中遵循的是一种适度原则,此一原则要求发展主体合理地约制自身的欲望,摆脱工具理性和消费享乐的束缚,追求生态智慧、审美德性以及人性进化多元发展的价值新境界。

(二)呼唤人性完善:共同体本位的道德价值追求

合理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和发展价值观的确立离不开优良人性的引导,在一定程度上,人性以特定形式、特定方式影响着发展价值观的制定和选择,而任何非合理的发展也势必引发社会利益结构和机

① [日]池田大作、[意]奥瑞里欧·贝恰:《二十一世纪的警钟》,卞立强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第83页。

② [法]奥克廷斯基·维克多:《未来启示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93页。

制的分化,造成人性的异化和分裂。在与历史演进的客观规律以及人性演化规律相契合的意义上,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活动,更是一种对合理性意义上新的人性道德价值的自主探索,这种探索是共同体本位多元文化和多元主体同时在场、自主建构的过程,强调的是对某种特定的公共价值的追求和实践过程。如此,人性道德的进化和完善往往彰显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

人性完善的目的在于涵养以共同体精神为核心的公共性品质与道德境界。后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公共价值信念遭到解构的时代,尤其是启蒙以来市民社会遭遇了以原子化个体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冲击,使现代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再具有普遍的整体性意义上的公度性,而是转向私人领域的个体利益最大化以及财富和权力的争夺和占有,这种由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价值观造成了现代社会个体生存的无根性、离散性和无意义感的倍增,从深层意义上说正是由于缺少了一种人类整体性福祉最大化的道德信念和高远境界。“共同体”作为当今世界多元现代化发展的一种形式,是相互依赖的个体在复杂庞大的社会体系中得以生存的基础。进入21世纪,由个体向共同体的转向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大趋势,此一背景下,中国政府顺应国际形势,站在人类共同福祉和长远利益的高度,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现实性、典范性和引领性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体现了人性所能达到的文明高度的实践表征。一方面,新发展理念所蕴含的人性价值,从根本上摒弃了亚当·斯密意义上精明算计的“理性经济人”的单一导向,倡导一种人类普遍福祉最大化以及人性整全性的发展主体道德信念。这就意味着要通过克服人自私自利的本性,约束不断膨胀的欲望,正视非合理的发展价值观所带来的价值危机和人性危机,使人性中光辉和善的一面得以呈现并引导发展走向光明;另一方面,合理的发展理应是全人类的共同生存和共同发展。在国际社会,对于任何试图以“西方中心论”“西方文明优越论”对经济落后的国家之发展主体和权益的戕害,任何试图“用同一性代替多样性,用连贯的、明晰的秩序替代相互矛盾的状态”^①,都是违背人道的、非合理的发展。在这一信念的引领下的发展是多元的,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这样的发展不仅是价值和理念上道德共识的达成,而且还倡导一种以尊重、包容为核心的“承认的政治”以及人类共同体的“集体行动”逻辑。德国社会理论家阿克塞尔·霍耐特认为:“越是一个好社会,人们的生活越具有公共性;相反,越是一个不好的社会,人们也就越疏远公共生活,退缩到孤独的自我之中。仇恨、歧视、等级差别、剥夺权利等,各种社会排斥行为造成的伤害不只是针对个人,而且更是针对整个社会。缺乏承认的社会不可能成为一个被广泛认同的公共社会。”^②在一种新质的全球伦理共同体生成和重建的意义上,促使国际社会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更加包容的胸襟、更加高远的卓识,共同走出一己私欲的藩篱和民族国家的局限,使公共性的道德信念成为一种全球社会的普遍自觉,为“类”本位时代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共同繁荣的多元现代化发展做出共同努力。

(三) 诗意栖居的愿景:迈向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美学境界

美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尼德·古莱说道:“发展乃是彻底的解放,这种解放的目的是要将人类从自然的枷锁中、从经济落后和压迫性的技术体制中解放出来,从不公正的阶级结构和政治剥削者、从文化和心理异化中解放出来——总之,从一切非人性的生活中解放出来。”^③马尔库塞认为,人类真正的自我解放只能发生在“美学”领域,因为在此领域中的人类实践活动“不是借助某物来消遣;而是生命本身的消遣,它超越了欲望和外部强制,是无忧无虑地生存的表现,因而是自由本身的表现”^④。缘由在于“人只有在摆脱了内外、身心的一切压制时,只有在美的享受中,才能够完全处于解放的自由之中,才能摆脱

① [英] 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张成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页。

② [德] 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5页。

③ [美] 德尼·古莱:《残酷的选择》,高铨、高戈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9页。

④ [德] 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37页。

既有社会对身心的束缚”^①。而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以及人性整全性理想的实现，标志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真正地进入到一个美学境界。他进一步说：“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人。”可见，“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②。发展的美学境界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生态系统之间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审美实践的探索过程，它追求的是一种生态美学智慧、审美德性以及人性整全的公共价值。这样一种社会发展、人类发展的终极境界是海德格尔意义上人类“诗意栖居”的现代生存论美学图景。

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Human Nature from “Multiple Modernity” Theory

WANG Xin

(School of Philosophy, Center for studies of Values and Cul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Since the mid-20th century, modernization reflections and criticisms in the world have continued to expand in dep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a single social and economic activity, but also an independent exploration process of self-practice, self-perfection and self-integration of human nature in the sense of rationality. In this sense, during the three to four hundred years of Western society with enlightened modernity, the developmental ideology that purely pursues economic growth and wealth accumulation has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Consequently, modern people are enjoying material abundance,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while bearing the consequences of increasingly utilitarian, alienated and dehumanized development. In the post-globalization era, the increasingly awakened modern people have begun to realize that development without restriction will never bring a better life and the perfection and promotion of human nature. For the future, human healt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economic growth, material possessions and human pleasure but set views, modes and directions for reasonable and good development. Meanwhile,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more on the gener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good human nature and to fundamentally overcome the survival, value, and human nature crises in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by shaping human ecological character. In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mong the social communities, and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ourselves, it is necessary to seek a new wa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at fits and adapts to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nature towards a future with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multiple modernity of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Keywords: Multiple Modernity, Humanity, Developmentalism, Alienation Logic, New Standard of Survival

[责任编辑：谢雨佟]

① 丁国旗：《“审美救治”与艺术教育——对马尔库塞教育思想的一种解读》，《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3、323页。